

论蕲春毛家咀一类遗存的来源 ——兼及西周早期对南土的经营

On the Origin of a Class of Remains from Maojiazui, Qichun County,
with Refere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Southern Territory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张振腾 Zhang Zhenteng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太原, 030006

于朋飞 Yu Pengfei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 710054

内容提要:

陶器风格的相似性说明, 殷墟北徐家桥区域使用特色撇足联裆鬲和酋、酉族氏铭文铜器的人群, 可能是在殷墟二期左右从江汉地区迁居殷墟。湖北蕲春毛家咀和新屋塆遗址所见的撇足联裆鬲、釜形鼎、敛口甗和酋族铜器可能来自殷墟范围内, 与北徐家桥遗址有一定的联系。西周早期毛家咀一类遗存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出现, 与太保南征打通“金道锡行”路线及其后设置据点获取铜、锡资源的行动有关。聚落分析表明, 西周早期南土存在“中心区—外围区—据点区”三层聚落结构, 周人通过分迁下层殷遗民、笼络上层殷遗贵族的方式保证了“金道锡行”的畅通。

关键词:

西周早期 殷墟遗址 毛家咀 南土

Abstract: The similarity in pottery styles suggests that the people in the Beixujiaqiao area of the Yinxu site, who used distinctive pottery tripods with splayed feet and flat crotches, as well as bronze vessels inscribed with clan names such as “qiu” and “you”, were likely migrants from the Jianghan region who settled in Yinxu around Phase II. The above-mentioned *lei*, kettle-shaped tripods *ding*, converging-mouth vessels *jia*, and Qiu-clan inscribed bronzes unearthed at the sites of Maojiazui and Xinwuwan in Qichun, Hubei, may have come from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Yinxu, and have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Beixujiaqiao site. The appearance of Maojiazui remain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is related to Taibao's southern expedition to open up the gold and tin routes and his subsequent establishment of strongholds to secure copper and tin resources. Settlement analysis shows that a three-tier settlement structure of “center area - peripheral area - stronghold area” exis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Zhou people ensured the smooth flow of the “Golden Road and Tin Route” through the relocation of the lower Yin remnants and the enlistment of the upper Yin aristocracy. The Zhou people ensured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Golden and Tin Route” by relocating the lower Yin remnants and enlisting the upper Yin nob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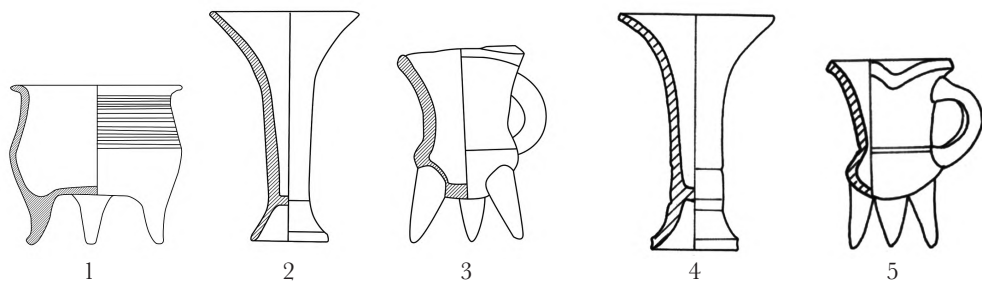
Key Words: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Yinxu site; Maojiazui; the Southern Territory

20 世纪湖北蕲春毛家咀遗址和附近新屋垮窖藏的发掘,使学界认识到了商周之际鄂东南地区的一类独特遗存^[1],有学者称之为“毛家咀类遗存”^[2]。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鄂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为大路铺文化的分布范围,“毛家咀类遗存”仅在毛家咀遗址和新屋垮遗址以及黄梅金城寨遗址有少量发现^[3]。考虑到新屋垮窖藏出土铜器的等级和年代,学者多将两遗址视为西周早期周人为获取铜料在鄂东南设立的据点。这一观点虽然符合这类遗存等级高、分布范围小的现有情况,但是无法解释为何该遗址陶器面貌与典型的殷墟及西周文化有较大差别。近年来,安阳北徐家桥墓地的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牛世山、何毓灵、常怀颖先后注意到了毛家咀遗址所见的撇足联裆鬲同北徐家桥墓地和小屯南地区出土陶鬲的相似性,他们均认为殷墟所见的撇足联裆鬲是受到了毛家咀遗址同类器的影响^[4]。但毛家咀遗址的年代已晚至周初,又如何能影响晚商时期的殷都呢?随着北徐家桥报告的正式出版^[5],我们对该问题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认识,试述如下。

一 遗存分析

(一) 安阳北徐家桥墓地

北徐家桥墓地位于殷墟遗址中部,安阳市考古研究所于 2002 年对该区域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多座四合院居址及大量墓葬。报告将该墓地墓葬分为四期,分别对应殷墟二期、殷墟三期、殷墟四期、西周初年。该墓地可分期的 292 座墓葬中有 225 座随葬陶鬲,发掘者将随葬的陶鬲分为 10 型,其中 H 型撇足联裆鬲、K 型高领束颈鬲与毛家咀遗址出土陶鬲形制相同,另有一些墓葬随葬的撇足鼎、硬陶撇足甗也见于毛家咀遗址。H 型撇足联裆鬲发现数量较少,共 7 件(图一:1)。报告认为这类鬲的年代从殷墟二期延续至殷墟四期,年代上限估计偏早。M83 是原报告认为年代最早的一座随葬撇足联裆鬲的墓葬,该墓随葬陶觚腹部竖直且占器身比例很大、整体瘦高,陶爵颈腹分界明显、鼓腹、整体显瘦高(图一:2、3)。这些特征与殷墟二期的陶觚、爵有别,年代当晚至殷墟三期早段,与之类似者如戚家庄东 M190 随葬陶觚、爵(图一:4、5)^[6]。随葬 H 型陶鬲的 M236 打破建筑



图一 安阳北徐家桥墓地 H 型陶鬲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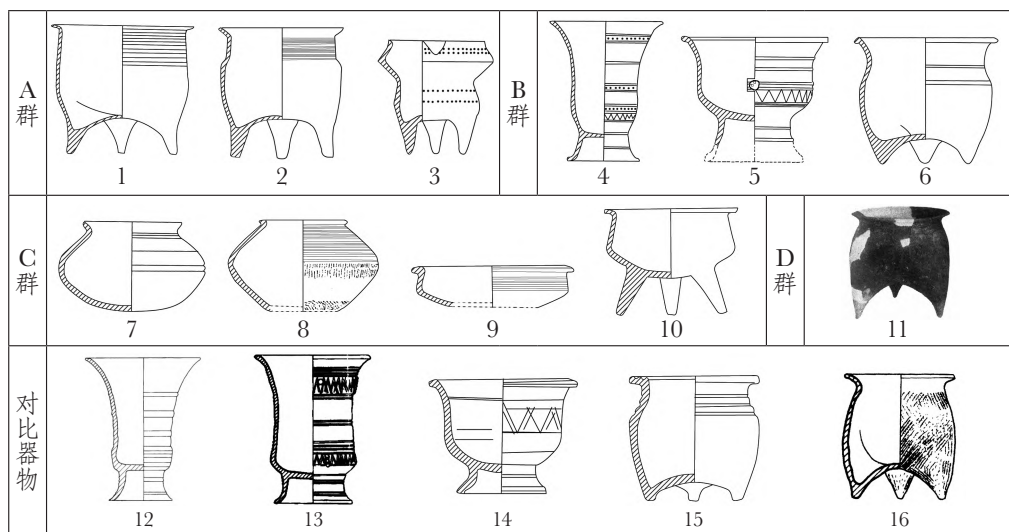
1. 鬲 2、4. 觚 3、5. 爵 (1-3. 北徐家桥 M83: 1-3 4、5. 戚家庄东 M190: 4、3)

基址，年代大致在西周初年，故该墓地 H 型陶鬲年代从殷墟三期早段延续至西周初年。K 型高领束颈鬲存续年代被发掘者定为殷墟三期到西周初年，随葬硬陶撇足甗的 M241、M539 被发掘者定为殷墟四期早段，随葬撇足釜形鼎的 M83 则被定为殷墟四期晚段，这些意见基本可从。

综上，北徐家桥墓地所见与毛家咀遗址相似陶器的年代可能从殷墟三期延续至西周初年。由于盗扰严重，该墓地出土的有铭铜器仅 4 件，其中 2 件爵上都有族氏铭文“酋”字，年代在殷墟三期（图三：11、12）。此外，1991 年发掘的北徐家桥 M23 还出土了一组“酉”族铜器，这说明该区域在晚商时期或许存在着酋族与酉族两支人群^[7]。

（二）蕲春毛家咀及新屋垮窖藏

毛家咀遗址发掘报告虽未标明器物的出土单位，但从器物前所标探方号可知这些陶器大都出土于 1、2 号房址及其周围，年代应大致共时。这些器物中的陶尊、簋、高领束颈鬲、联裆鬲属于可断代的典型器物。陶尊出土于 F2 内，器体较高，侈口，腹部外鼓不明显，与殷墟三期大司空东 M43：6 器型相似；唯其器身所施的多圈圆点纹、三角刻划纹及圆饼装饰与同期陶尊流行的简单弦纹不同，更为接近殷墟四期陶尊的装饰风格，如小屯西北地 H71：27（图二：4、12、13）^[8]，李晓健认为周边地区所见这类尊的年代已经晚至西周初年^[9]。陶簋也出土于 F2 内，侈口，上腹竖直部分较高，器身饰刻划三角纹、弦纹还有泥饼装饰，其形制大致同于殷墟四期的大司空北 M71：2（图二：5、14）^[10]。高领束颈鬲，侈口、束颈、矮足、低



图二 蕲春毛家咀遗址器物分群及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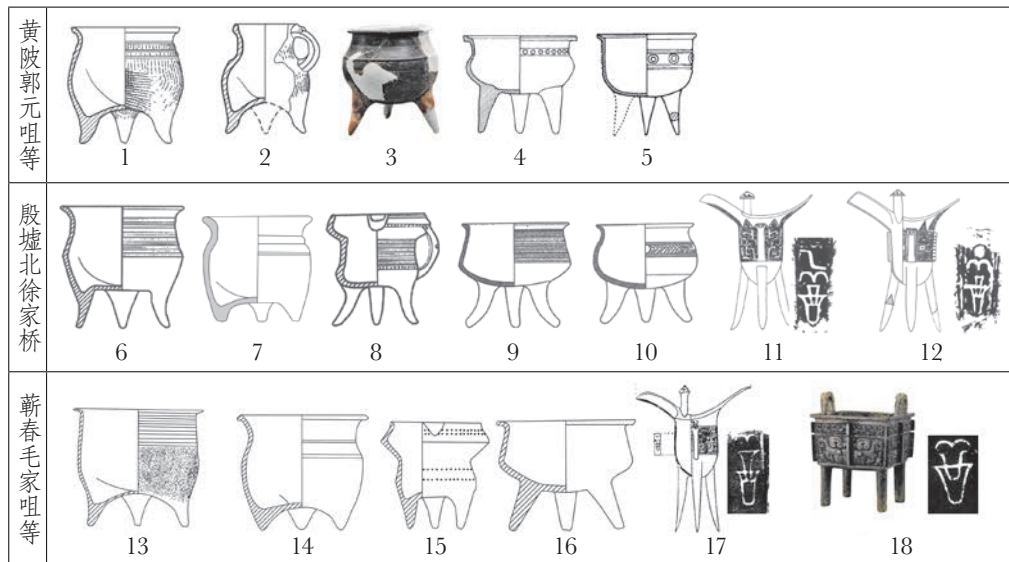
1、2. 撇足联裆鬲 3. 敛口甗 4、12、13. 尊 5、14. 簋 6、15. 高领束颈鬲 7. 圆底罐 8. 平底罐 9. 折腹盘 10. 釜形鼎 11、16. 联裆鬲 (1-11. 蕲春毛家咀 II 12/2:3:10、III 9/1:3:3、II 2/2:2B:30、II 9/5:3:32、III 9/1:3:33、I 4/5:3:36、I 25/3:3:13、I 23/2:2F:3、II 9/5:3:17、II 9/5:3:7、II 7/1:3:27 12. 安阳大司空东 M43:6 13. 安阳小屯西北地 H71:27 14. 安阳大司空北 M71:2 15. 安阳大司空 M329:2 16. 沔西 96SCMM5:1)

裆,形制近同于殷墟四期的大司空 M329:2(图二:6、15)^[11]。弧腹绳纹鬲,侈口、领较高、深腹较直、裆部为联裆,形制接近于西安沣西张家坡 96SCMM5:1(图二:11、16)^[12],年代已晚至西周初年。综上,毛家咀出土可断代陶器的年代大致都在殷墟四期晚段到西周早期这一阶段,考虑到联裆鬲的存在,其年代定为西周早期为宜。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1件铜爵,爵柱远离流折,三棱刀形足,年代约在殷墟三、四期,其上有族氏铭文“酋”(图三:17)。酋族铜器目前发现较少,仅见于安阳殷墟、湖北蕲春、陕西宝鸡、安徽望江^[13]。李学勤先生将新屋湾出土铜器的年代定为商末周初,基本可从^[14]。该窖藏所出的1件方鼎上也有族氏铭文“酋”,说明毛家咀及新屋湾一带可能生活着西周早期的酋族人群(图三:18)。

根据来源的不同,可将毛家咀和新屋湾出土的器物分为四群。A群包括撇足联裆鬲、敛口甗(图二:1-3),这些器物虽然不是典型的殷墟文化因素,但目前仅在殷墟北徐家桥墓地发现有与之组合相同且年代较早的同类器,暂可归为非典型殷墟文化因素。B群包括高领束颈鬲、陶尊、陶簋、铜爵、铜鼎,属于典型的殷墟文化因素(图二:4-6)。C群包括侈口鼓腹圜底或平底罐、折腹盘、釜形鼎等,这类器物在长江中游的炭河里文化、大路铺文化、吴城文化中均有发现,大致可归为本地土著因素(图二:7-10)。D群为联裆鬲,属于周文化因素(图二:11)。在诸群器物中,来自殷墟的A群和B群文化因素占据了主体地位。

(三) 撇足联裆鬲的来源

前文分析表明,毛家咀和新屋湾遗址独具特色的撇足联裆鬲、高领束颈鬲、敛口甗、釜形鼎均见于殷墟北徐家桥墓地,该区域所见此类器物的年代明显早于毛家咀遗址出土同类器,故殷墟地区的类似器物绝非来自毛家咀类遗存(图三:13-16)。这就不免引出另一个问题,撇足联裆鬲并非殷墟遗址的典型器类,殷墟遗址的这类陶鬲来源于何处?新近发掘的黄陂郭元咀遗址为探索该问题提供了线索^[15]。该遗址的年代大概在殷墟一期前后,属豆海锋所界定的盘龙城类型晚期遗存^[16]。已公布的器物中有不少撇足联裆鬲、撇足甗、折腹罐形鼎(图三:1-3)。鬲撇足联裆和上腹部施多条弦纹的风格与殷墟北徐家桥墓地陶鬲相同,唯其弧肩风格与北徐家桥墓地同类器的折腹风格不似(图三:6)。这种撇足的风格还见于费家河文化、石灰山文化陶器中,可能是长江中游区域诸文化较为流行的作风^[17]。值得注意的是,郭元咀遗址出土的陶鼎为折腹风格,与北徐家桥墓地出土的撇足联裆鬲相似,不排除陶鬲折腹的风格是从陶鼎借鉴而来(图三:3)。甗的足部风格与北徐家桥墓地出土的甗相同,均为撇足(图三:2、8)。釜形鼎是晚商时期长江中游诸文化均流行的器类,在吴城文化、荆南寺遗存中均有发现(图三:4、5)^[18]。北徐家桥墓地出土的1件殷墟四期釜形鼎器身施以燕尾纹,这种纹饰是南方青铜器特有的一类纹饰,在新干大洋洲铜器群中多见(图三:10)。这些线索均表明,殷墟北徐家桥墓地中一些非典型殷墟文化因素的



图三 相关遗存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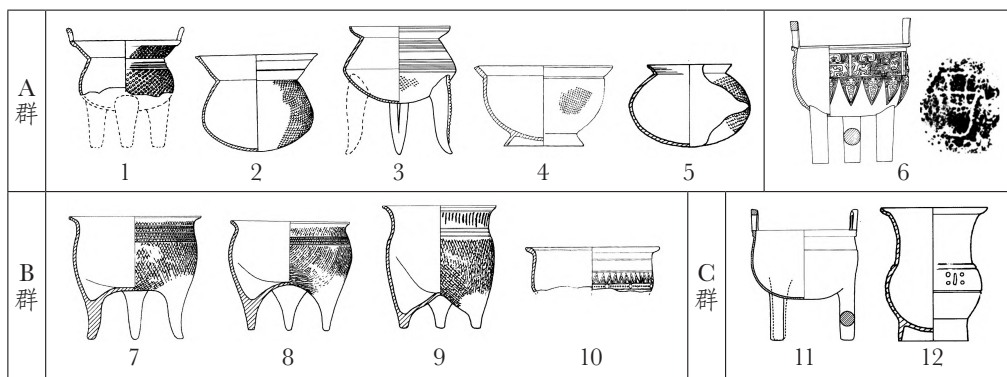
1、6、13.撇足联裆鬲 2、8、15.斚 3.折腹罐形鼎 4、5、9、10、16.釜形鼎 7、14.高领束颈鬲 11、12、17.铜爵 18.酋方鼎 (1-3.黄陂郭元咀遗址 H16:3、G7①:48、G7④:12 4.新干大洋洲墓葬 XDM:556 5.荆州荆南寺 T22④:3 6-12.殷墟北徐家桥墓地 M296:2、M495:1、M539:1、M85:1、M184:1、M120:3、M320:2 13-17.蕲春毛家咀遗址Ⅲ 8/1:3:3、Ⅰ 4/5:3:36、Ⅱ 2/2:2:2B:30、Ⅱ 9/5:3:10、水塘采集 18.蕲春新屋垮窖藏)

器物很可能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殷墟一期商王朝势力撤离该地时，原居此地的人群有可能也随之撤往殷墟地区，使得殷墟北徐家桥墓地发现了与该地区风格相似的器物^[19]。但由于目前尚未发现殷墟二期的类似遗存，北徐家桥墓地中这些特色器类的直接来源仍待进一步探索。

综上，殷墟遗址所见的撇足联裆鬲并非来自于西周初年的蕲春毛家咀遗址，而更有可能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郭元咀一类遗存。毛家咀遗址所见的成群殷墟文化陶器和酋族铜器表明，居住于此的人群可能是周初分迁至此的殷遗民。撇足联裆鬲、折腹罐形鼎等特色陶器既有可能是本地郭元咀一类遗存的遗留，但也不排除自殷墟辗转南下的可能。北徐家桥和毛家咀遗址中均见有撇足联裆陶鬲+殷墟文化陶器+酋族铜器的组合，这种组合还见于后文所述的怀宁孙家城遗址中。在商周之际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相同器物组合和相同族氏铭文铜器在不同区域的出现，无疑反映出人群的迁移与流动。

二 毛家咀一类遗存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

向桃初注意到了毛家咀一类遗存对长江中游的影响，他指出炭河里文化遗址中所见的撇足联裆鼎、商式簋等器物与毛家咀遗址关系密切，其说甚是^[20]。牛世山更是进一步注意到长江中下游的赣北、皖西南一带也存在与毛家咀遗址类似的陶器组合^[21]。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遗存加以分析。



图四 炭河里文化陶器分群及出土西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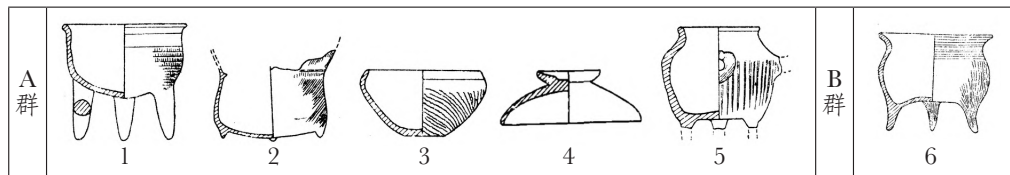
1. 束颈鼎 (高 AM19 : 1) 2. 釜 (高 AM19 : 14) 3. 釜形鼎 (炭 05G5 ⑥ : 32) 4. 矮圈足簋 (炭 05G5 ⑦ : 6) 5. 侈口扁腹罐 (高 AH5 : 6) 6. 西鼎 (高 AM1 : 18) 7. 撇足联裆鬲 (炭 05G5 ⑥ : 46) 8. 侈口矮联裆鬲 (炭 05G5 ⑦ : 3) 9. 高领束颈鬲 (炭 05G5 ⑥ : 38) 10. 刻划三角纹簋 (炭 05G5 ⑥ : 104) 11. 陶鼎 (炭 05G5 ⑥ : 46) 12. 陶尊 (高 AM7 : 3) (望城高砂脊筒称为高, 宁乡炭河里简称为炭)

(一) 炭河里文化遗址

炭河里文化是指分布于湘江下游以宁乡炭河里遗址、望城高砂脊遗址为代表的遗存, 遗存主体年代大致从商末周初延续至西周中期^[22]。该文化的陶器可粗略分为三群。A 群包括束颈鼎、釜、釜形鼎、矮圈足簋、侈口扁腹罐等 (图四 : 1-5)。向桃初和豆海锋对 A 群器物的来源有很好的研究, 认为该群器物是由本地因素与鄂东南、赣北、湘西北土著文化因素混合而成, 其说可从。B 群包括撇足联裆鬲、刻划三角纹簋, 这两类器物与毛家咀遗址出土的器物相同 (图四 : 7、10)。另外两件侈口矮联裆鬲和高领束颈鬲虽来源不明, 但侈口矮弧裆和高领束颈的风格同鄂东南和赣北地区同类器相似, 暂归为 B 群 (图四 : 8、9)。C 群包括仿铜陶鼎、陶尊, 这些器物是本地人群以周文化的铜器为模板制作, 可视为非典型的西周文化因素 (图四 : 11、12)。在主要陶器群中, A 群陶器占据了主体地位。炭河里文化与鄂东一带的西周早期文化遗存交往十分紧密, 一方面体现在鄂东毛家咀的特色陶器出现于炭河里文化的中心聚落中, 另一方面炭河里文化典型的束颈鼎也见于叶家山曾国墓地中, 甚至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类似的束颈铜鼎, 这说明两种文化处于频繁交流的状态^[23]。

(二) 九江神墩遗址

神墩遗址位于九江县城西北 16 公里的新合乡境内,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会同九江市博物馆等单位于 1984 年和 1985 年秋冬, 对神墩遗址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 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商代和西周时期水井等遗迹^[24]。豆海锋将该遗址的商周遗存分为两组, 他指出 85J1 和 84 ② C 为代表的遗存年代已进入商末周初, 其说可从。值得注意的是, 85J1 中一些器物的年代明显偏早, 如假腹豆 85J1 : 6 形制与吴城文化早中期的同类器相似, 分裆鬲 85J1 : 1 形体瘦高, 这两件器物的年代



图五 九江神墩遗址西周陶器分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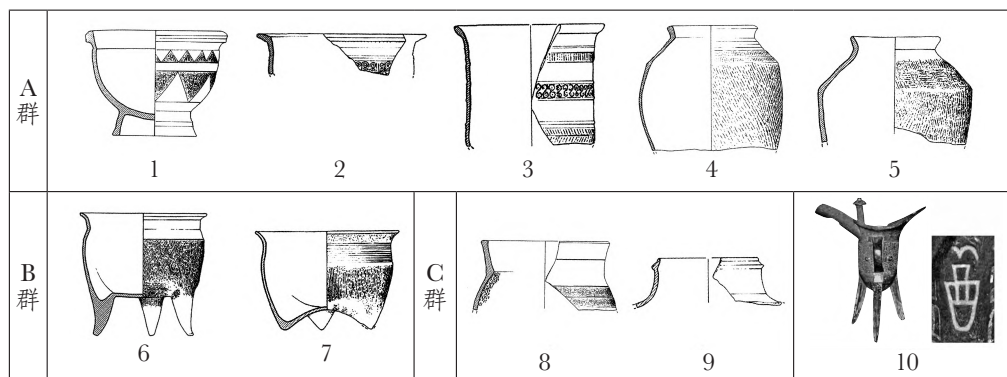
1. 釜形鼎 (84T1 ② B:2) 2. 圜底矮足甗 (84T2 ② B:2) 3. 敛口钵 (84T26 ② B:14) 4. 器盖 (84T1 ② B:60) 5. 角把盃 (84T1 ② B:16) 6. 撇足联裆鬲 (84T1 ② C:2)

似晚不到周初,故我们倾向于将 85J1 归为晚商时期。此外,84 ② B 层出土的釜形鼎、圜底矮足甗与大路铺遗址第二期遗存形制类似,年代大致也可归为西周早期,与 84 ② C 层大致同时。由于材料报道较为简单,暂粗略将该遗址的西周早期遗存分为两群。A 群包括釜形鼎、圜底矮足甗、敛口钵、器盖、角把盃等,属大路铺文化因素(图五:1-5)。B 群为撇足联裆鬲,与鄂东南的毛家咀遗址的同类器相似(图五:6)。A 群大路铺文化因素在陶器群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这表明西周时期该遗址很可能属大路铺文化。毛家咀据点在大路铺文化范围内的设立以及神墩遗址所见两类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表明,周人治下的殷遗民与土著文化关系较为融洽。与上述文化面貌相似的还包括黄梅金城寨遗址,该遗址中也见有毛家咀遗址典型的撇足联裆鬲同大路铺文化刻槽鬲共存的情况。

(三) 怀宁孙家城H29

孙家城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安徽省怀宁县马庙镇栗岗村孙家城和费屋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怀宁县文物局于 2008 年发掘了该处遗址,发现了少量西周早期遗存,其中以 H29 资料最为丰富^[25]。该灰坑出土陶器可分为三群,A 群包括侈口厚唇簋、敞口薄唇簋、分裆鬲、尊、红陶绳纹罐和厚胎折肩罐,发掘者已指出其属殷墟文化因素(图六:1-5)。B 群包括撇足联裆鬲、侈口矮联裆鬲,其中撇足联裆鬲与毛家咀所出陶鬲相似,侈口矮联裆鬲足尖残损,器身上部饰弦纹,下部饰绳纹以及矮弧裆的风格与毛家咀所出撇足联裆鬲相似,只是器型稍显矮胖(图六:6、7)。C 群器物包括少量直口罐、敛口罐,暂不清楚其归属,可能属本地文化因素(图六:8、9)。在主要器物群中,A 群和 B 群占据了主体地位,该灰坑的陶器组合及形制与毛家咀遗址极为接近,似可归为同一类遗存。考虑到该灰坑以中原式陶器为主的文化面貌,可以认为孙家城遗址很可能也是周人早期在皖西地区所设立的据点,李宏飞也认为 H29 与西周早期迁来此地的殷遗民有关^[26]。

综上,我们识别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3 种包含撇足联裆鬲的遗存。根据其遗存性质的不同,可将包括毛家咀及新屋湾遗址在内的 4 处遗址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毛家咀遗址和怀宁孙家城 H29,两者年代均在西周早期,主要陶器群均以殷墟文化器物为主。这类遗存可能代表了西周早期迁至南方地区的殷遗民。第二类为炭河里文化遗址和九江神墩遗址,主要陶器群均以土著文化为主,但均包含少量第一类遗存文化



图六 怀宁孙家城出土陶器分组及望江出土首爵

1. 侈口厚唇簋 (H29 ①: 36) 2. 敞口薄唇簋 (H29 ①: 94) 3. 尊 (H29 ④: 75) 4. 红陶绳纹罐 (H29 ④: 105) 5. 厚胎折肩罐 (H29 ④: 57) 6. 撇足联裆鬲 (H29 ①: 14) 7. 侈口矮联裆鬲 (H29 ①: 15) 8. 直口罐 (H29 ①: 34) 9. 敛口罐 (H29 ④: 63) 10. 首爵 (望江南畈村)

因素,属于与殷遗民交好的土著人群。周人将殷遗民强制迁至南土,派往外围深入土著文化范围内的据点,在与土著文化共存的过程中,两者的文化因素相互交融。

值得注意的是,鄂东的毛家咀遗址距离炭河里文化较远,二者甚至不位于同一条交通水路上,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炭河里遗址中所见鄂东因素器物的传播途径。前文已述,根据遗存性质可将长江中下游含毛家咀类遗存的遗址分为单纯的周人据点和与周人交好的土著文化遗址两类。在鄂东赣北这一区域内,毛家咀遗址这样的据点对应着武穴磨尔山、九江神墩、黄梅金城寨这样的大路铺文化遗存,这些遗址通过长江水路可顺畅地联通^[27]。与之对应的是,长江下游的皖西南地区既发现了怀宁孙家城这样的据点,也在潜山薛家岗及怀宁跑马墩发现了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土著遗存^[28]。更为巧合的是,距孙家城遗址不足 50 公里的望江县南畈村发现了带有族氏铭文“酋”的殷墟晚期铜爵(图六:10)^[29],这一情形同鄂东南何其相似。这一现象启示我们,湘北地区的炭河里文化范围内可能也有着类似于毛家咀遗址这样的据点与其交流。前文已述,北徐家桥一带除酋族外还有酉族人群,该族的铜器目前只见于殷墟北徐家桥、湖南长沙、安徽颍上等地,数量较少。而在属炭河里文化的高砂脊墓葬中恰随葬了 1 件带有族氏铭文“酉”的殷墟三期铜鼎(图四:6),这可能暗示着炭河里文化人群同酉族人群的密切关系,被周人派驻至炭河里文化据点内的人群可能来自北徐家桥墓葬的酉族。鄂东、赣北及皖西南地区是中国铜矿资源的富集区,这些地区已经发现了大量早至晚商时期的矿冶遗址,在九江神墩遗址中发现了冶铸金属的现象,怀宁孙家城遗址周边也发现不少采矿和冶炼遗址^[30]。西周早期,源自殷墟北徐家桥墓地的特色撇足联裆鬲和酋、酉两族铜器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出现,当与周人分迁殷遗民获取本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有关。

传世春秋早期的曾伯簠铭文称:“……抑燮繁阳、金道锡行……。”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多件曾伯器的发现,使得我们确定曾伯簠大概率出自随枣走廊一带^[31]。“金道锡行”的铭文表明,沿随枣走廊一带输送的矿料不仅包括铜,还包括锡。学界现

有研究表明,鄂东和赣北地区的大冶和九江一带是西周时期铜料的重要产地,但关于锡料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李延祥等学者认为南方地区的锡料可能来自于江西地区^[32]。但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地区现探明的锡矿储量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18%,远高于江西地区,也可视为探索早期锡料来源的一个重要区域^[33]。湖南宁乡黄材盆地出土的大量商末周初时期铜器的来源一向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该地区所见中原式青铜器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十分罕见。学者们多认为这些青铜器与本地的炭河里文化有关,但无论是“本地铸造说”或是“殷遗民贵族逃亡说”都难以圆满地解释这些铜器的来源^[34]。鄂东赣北区和皖西南地区使用撇足联裆鬲和带有酋、酉族氏铭文铜器的人群在长江中下游的出现与周人获取金属资源行为有关,炭河里文化所见的同类器暗示着湘江流域可能也存在着如蕲春毛家咀、怀宁孙家城一类的资源获取据点。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宁乡铜器群中部分商末周初时期部分中原式铜器直接来源于周人,由于湘江流域距离周人核心区极远,直接占据管理该地获取锡料的成本较高,周人可能采取了赐予高等级的铜器的方式交好土著炭河里文化人群,以此维持锡料北运路线的畅通。由于缺乏冶金考古相关成果的证明,笔者的这一推论仍属假说,期待未来湘江流域的相关发现检验这一观点。

三 周人的南下与西周早期南土的经营模式

(一) 周人南下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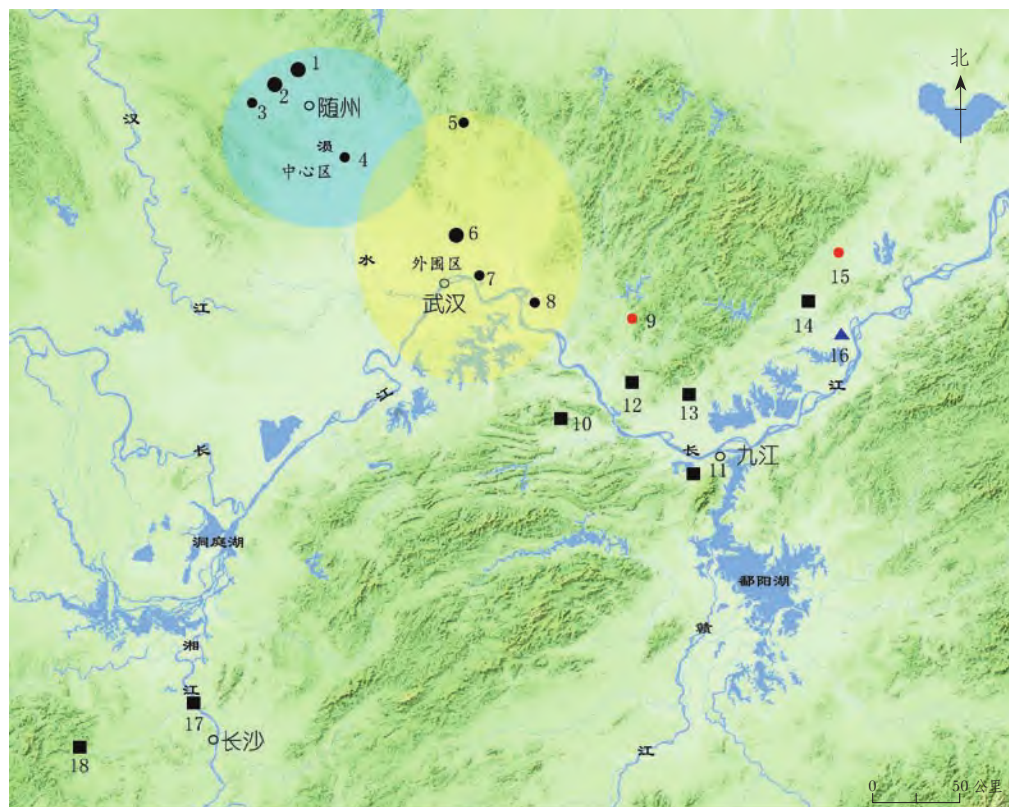
现有考古材料表明,在周人灭商后,殷墟的孝民屯等铸铜作坊仍延续使用,似乎说明此时的铜料仍然比较充足。但唐际根曾指出,殷墟遗址一些西周初年墓中随葬的铜器均为素面,器壁薄,且多出仿铜陶礼器,这种现象与铸铜原料短缺有关^[35]。这种矛盾的现象似乎表明,此时的铜料只能满足一些实用礼器的生产,难以满足随葬铜器的生产需求。周人灭商的战争和随后的“三监之乱”很可能使得晚商以来的“金道锡行”路线被迫中断,因此才产生了缺铜的情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铜料对于国家来说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对维持国家统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东征胜利之后,太保召公便立刻南下以打通道路获取铜矿资源,这一事件在太保玉戈中有明确记载^[36]。在“三监之乱”中战败的殷遗民自然成为了最好的兵源,居住在北徐家桥地点的人群可能因来源于江汉,熟悉南土环境,而成为了南下队伍中的一员。

北徐家桥居址和墓地的相关遗迹现象,为我们观察周人分迁殷遗民的具体细节提供了丰富材料。该区域的墓葬均位于居址内,且居址在商末周初遭受过大规模焚烧而废弃。整片墓地上有大量的盗沟,大多数都精准地打在墓葬之上。这种大规模精准盗掘的现象与殷墟王陵区、殷墟西区、后冈墓地大墓如出一辙,盗掘坑直接打在墓口上的盗掘手法也极为相似,应属同一批人所为。井中伟已指出殷墟王陵区等地大墓的盗掘发生在周公东征后,北徐家桥地点商墓被盗掘的年代大致亦

在此时^[37]。周人对殷商王陵和贵族墓葬的盗掘尚可理解为出于政治报复和获取宝器的目的,但对普通居址的焚毁和墓葬的盗掘目的可能并非如此,更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暴力方式驱逐殷遗民,断绝他们回归故土的念想,便于管理。这种现象不惟北徐家桥地点居址独有,在邻近的刘家庄北地和殷墟西南体育运动学校一带的遗迹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焚毁基址现象,这说明周人驱逐分迁殷遗民的手段是极为暴力的^[38]。

(二) 西周早期南土的经营模式

随州叶家山和羊子山曾、鄂两国墓葬的发现表明,太保的南征取得了成功,周人成功在江汉地区站稳了阵脚,建立了多处据点以获取南土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一带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早期遗址有随州叶家山墓地、羊子山墓地、庙台子遗址、叶家湾遗址、大悟吕王城遗址、新洲香炉山遗址、孝感聂家寨遗址、黄陂鲁台山墓地、黄冈螺狮山遗址、蕲春毛家咀遗址及新屋垮窖藏等。这些遗址大都位于交通便利的河流附近(图七)^[39]。



图例: ●中心性遗址 ●一般性遗址 ●外围据点 ■土著文化遗址 ▲铜器出土点

图七 西周早期南土主要聚落分布

1. 叶家山墓地及庙台子遗址 2. 羊子山墓地 3. 叶家湾遗址 4. 聂家寨遗址 5. 吕王城遗址 6. 鲁台山墓地 7. 香炉山遗址 8. 螺狮山遗址 9. 毛家咀及新屋垮遗址 10. 大路铺遗址 11. 神墩遗址 12. 磨尔山遗址 13. 黄梅金城寨 14. 薛家岗遗址 15. 孙家城遗址 16. 南畝村遗址 17. 高砂脊墓地 18. 炭河里城址及墓地

根据文化面貌、遗址的等级和地理位置,可将南土地区周人控制下的聚落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中心区,大致位于沮水上游。该区包括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和庙台子遗址、羊子山鄂国墓地2处中心性遗址,周围还有随州叶家湾、孝感聂家寨2处一般性遗址。本区的叶家山墓地是目前南土发现的最高等级遗存,最高统治者曾侯为西周开国重臣南公一支的后裔,该区应为周人直接掌控的区域。第二层级为外围区,大致位于沮水下游和长江北岸。该区的中心性遗址为黄陂鲁台山墓地,周边已发掘的一般性遗址包括新洲香炉山和黄冈螺蛳山、大悟吕王城3处,以往还在云梦、孝感一带调查发现了不少西周时期的遗址^[40]。本区的鲁台山墓地发现了一条带墓道的大墓M30,学者们根据铜器铭文指出该墓地应是以“长子狗”为代表的家族墓地。通过与长子口墓铜器铭文的联系,部分学者认为长氏是从豫东淮河支流涡河中游一带迁至此地,用以保障“金道锡行”的畅通^[41]。M30中出土的一组“公大史作姬𡵓”器表明,长子狗可能同毕公家族有通婚,周人可能是通过结婚的方式笼络、管控长氏,派遣以长氏为首的殷遗民管理南土的外围区^[42]。目前在沮水上、下游区域尚未发现本地土著文化遗存,两区遗址间基本也无空白区,这说明整个沮水流域应当都是周人直接占领的区域。第三层级为据点区,包括蕲春毛家咀遗址和怀宁孙家城遗址,本区所见都是一些孤军深入土著文化分布区的据点,这些据点的居民大部分为殷遗民。鄂东南、赣北、皖西南地区的大冶、九江、安庆一带是铜资源的富集区,在九江神墩遗址中发现了毛家咀类遗存因素和土著文化遗存共存的情况,说明这些外围据点区的人群可能和土著居民共同参与了铜矿资源的开采和冶炼。南土地区“中心区—外围区—据点区”这样的三级区域聚落结构背后可能隐含了与之对应的政治秩序。周人建立了多层的政治结构以控制和经营南土地区,铜矿资源则在这样的政治控制下沿长江、沮水一线从据点区经外围区进入中心区,最终输送至中原腹地。

四 结语

综上,本文认为湖北蕲春毛家咀和新屋垮遗址所见的撇足联裆鬲、釜形鼎、敛口甗等特色陶器和酋族铜器均来自于殷墟北徐家桥区域。陶器风格的相似性说明,殷墟北徐家桥区域使用特色撇足联裆鬲和酋、酉族氏铭文铜器的人群可能是从江汉地区迁居殷墟,在周人南征的背景下因熟悉南土环境而成为了南征军队中的一员。长江中下游流域所见含撇足平裆鬲和酋、酉族氏铭文铜器的遗址可分为周人据点和土著文化遗址两类,相关分析表明使用这些器物的人群多从事获取铜锡资源的工作。根据聚落结构和文化面貌的分析,本文认为周人在南土构建了“中心区—外围区—据点区”三层聚落结构,通过分迁低等级殷遗民和笼络殷遗民贵族的方式保证“金道锡行”的畅通。

注释：

- [1]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b. 湖北黄冈市博物馆、湖北蕲春县博物馆：《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塆西周铜器窖藏》，《文物》1997年第12期；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黄梅县博物馆：《湖北黄梅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6期。
- [2] 傅玥：《长江中游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88-92页。
-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编著《阳新大路铺》，文物出版社，2013年。
- [4] a. 牛世山、岳洪彬、岳占伟：《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以陶鬲为例》，《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b. 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c. 牛世山：《湖北东北部晚商文化的新认识——从蕲春毛家咀遗址和新屋塆青铜器谈起》，《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d. 常怀颖：《晚商殷墟小型墓随葬陶鬲的若干问题》，《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01-321页。
- [5]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北徐家桥2001-2002年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本文所引安阳北徐家桥材料及发掘者观点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该书，不再另注。
- [6] a.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断代据 b. 李晓健：《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何毓灵也指出随葬撇足鬲墓葬的年代上限在殷墟三期，见 c. 何毓灵、赵清荣：《殷墟北徐家桥墓地“南方文化因素”器物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23年第4期。
- [7]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8]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东地商代遗存2012-2015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2期；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世界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 [9] 李晓健：《再谈滕州前掌大墓地的性质》，《考古与文物》2023年第3期。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
- [12] 毛家咀此鬲线图绘制失真，似柱足分裆鬲，然从照片观之，应为锥足联裆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 [13] 万冰冰：《出土族氏铭文所见殷墟族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37页。
- [14] 李学勤：《谈孟方鼎及其他》，《文物》1997年第12期。
-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武汉市黄陂区文物管理所：《武汉市黄陂区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商代遗存》，《考古》2021年第7期。
- [16] 豆海锋：《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科学出版社，2021年。本文所引豆海锋观点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该文，不再另注。
- [17] a. 罗仁林：《岳阳地区商时期的文化序列及其文化因素分析》，《湖南考古辑刊》（第7辑），岳麓书社，1999年，第223-251页；b.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市博物馆：《江西瑞昌市檀树咀商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2期。
- [18] a.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b. 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 [19] 郅向平先生认为商文化分布范围的收缩和聚落数量的缩减是与同时期殷墟聚落面积的扩张和人口数量的增加相对应的，体现了人口向都城聚集的趋势。参见郅向平《商系墓葬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76页。目前来看这些迁入都城的人口很可能来自商人控制的边缘地区，如江汉地区等。
- [20]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线装书局，2008年，第91-138页。
- [21] 同[4]c。
- [22] a.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6期；b.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

- 年第4期。
- [23] 陈小三：《简论曲村墓地发现的南官姬鼎》，《江汉考古》2014年第6期。
- [24]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九江市博物馆：《江西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 [2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宁县文物局：《安徽省怀宁县孙家城遗址H29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
- [26] 李宏飞：《孙家城H29陶器群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 [27] 陆成秋等：《黄冈武穴磨尔山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68页。
- [28] a.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b. 杨德标、金晓春、汪茂东：《安徽怀宁跑马墩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
- [29] 崔恒升：《安徽出土金文订补》，黄山书社，1998年，第316页。
- [30] 崔春鹏：《长江中下游早期矿冶遗址考察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03页。
- [31] a.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卷304页；b. 方勤、胡长春、席奇峰、李晓杨、王玉杰：《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
- [32] 李延祥、崔春鹏、李建西、陈树祥、龚长根：《大冶香炉山遗址采集炉渣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
- [33] 李聪：《中国锡矿床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研究》，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3页。
- [34] 本地铸造说参见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年；殷遗民贵族逃亡说参见[20]。
- [35] 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6-50页。
- [36] 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
- [37] 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考古》2010年第2期。
- [38] 何毓灵：《殷墟刘家庄北地青铜窖藏坑性质探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 [39] a.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编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b. 随州市博物馆编《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c.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d.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湖北随州叶家湾遗址发掘简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北考古报告集》，江汉文物编辑部，2008年；e. 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大悟吕王城遗址》，《江汉考古》1990年第2期；f. 香炉山考古队：《湖北武汉市阳逻香炉山遗址考古发掘纪要》，《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g.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h. 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i.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考古》1962年第7期。
- [40]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地区文物普查概述》，《江汉考古》1990年第2期。
- [41] 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61-262页。
- [42] 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9-60页。

(责任编辑 沈 萌)